

「對太陽花說不！」：

左翼酷兒的性／別家國詰難

洪凌

深思熟慮的愚蠢與殘酷：試論充滿自主性的太陽頭顱

2014年3月18日以占領立法院開始的太陽花學運，乃是某種早已成型、晚近由第一世界帝國勢力微妙輔助的「東方花革命系列」抗爭，而不是獨特突發於台灣且毫無淵源脈絡之物。首先，我想闡述的是：太陽花之「眾」並非沒有能力進行思考的主體，而是受到常態自由主義主張之「民主自由」普世價值所局限與魅惑，而形成的「去頭顱」化的「公民台灣人我族」，是一堅定不容許異物穿越於疆界內外，乾淨堅決而整齊的「秩序維護體」。

在〈太陽花的太陽為什麼是黑色的？〉與相關文章，如〈冥王星民主：從納粹的崛起看太陽花學運〉與〈太陽花的敵友政治與馬賽克手法〉中，路況以毫不粉飾的犀利與理論高度，嚴厲批評了太陽花運動當中的「低級思想」¹。我想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再低級的

1 路況的三篇文章皆刊於其網路部落格「再見河左岸」：〈冥王星民主：從納粹的崛起看太陽花學運〉，2014年4月30日：<http://blog.udn.com/loukwan/12920452>；〈太陽花的太陽為什麼是黑色的？〉，2014年4月4日：<http://blog.udn.com/loukwan/12251450>；〈太陽花的

思想也是某種意識操作，而非「無思想」。路況的批判精確地攫取了鄂蘭與德勒茲論證「平庸／愚蠢—殘忍／惡性」的揮發公式，並援引了某些流行文化的例子來證明其論點。除了同意路況所針砭之處，我想補充的論點是：與其認為太陽花學潮的恐怖只集中於「愚蠢的殘忍」，毋寧說，參與之眾所呈現出來的特色，將路況所推論的「無思想性／愚蠢→惡之平庸性／低級→極端之惡／殘酷」發揮到極致，其根基乃是雙重運作缺一不可的基因螺旋體：一端是常態主體被擠壓（或被鼓勵）出來的高亢叛逆「自主性」，另一端則是有選擇性的溫情秩序、整齊守禮的「先進國／城邦市民」屬性。

路況以「吸血殭屍」來比喻此運動場景的人群與執行者（糾察隊、醫療團、律師、自由派大學教師及研究員等），但我認為，這場運動的群眾性格並不如此「超真實」地迅速、精確、狠辣，也不至於全然「去了思惟」，但我的意思不是說，這樣的思路真有什麼好讓我們期待的「後設反思」。真正猙獰不堪的精華恐怕在於，這些參與的人們應該是在絞盡腦汁思索後，得到了以下的結論：外來巨大異己物（在此處，既是中國政權，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是民族主義的「支那孽畜」）是必須被剷除的，但處於疆界之內的台灣人則是必須被「分層且（實質不）友善」地治理的。無論是（階層不同的）學生、非學生合格市民、專業高檔人士、底層弱勢者、民兵護衛隊、支持此運動的外籍人士（且精細區分為「純外國人」與「第三世界」，如台灣人慣常鄙視稱呼的東南亞外勞以及中國大陸民運人士等），甚至於「來鬧的小混混」之類，都在此種分殊管理且表面上彷彿符合台灣人想像的「小國好民，物資豐湧」的

（續）

敵友政治與馬賽克手法〉，2014年4月4日：<http://blog.udn.com/loukwan/12251826>。

操作系統之內，經由各種可見與不可見的廝殺競逐與排擠驅離，取得言不正、名不實的正當性。經過幾天的混亂期間之後，原先渾沌的「眾」（某些成員等於被迫）實踐了民主代議制與黑箱程序，逐漸彼此區隔且分別占據了女王蜂，工蜂，雄蜂，蜉蝣生命，蜂巢原料等位置。這樣的「民主台灣之眾」真心且充滿好意地體現出，從內層占領者的二百人小圈圈（與最核心之「女王蜂」九人小組）到外層數千上萬之「基底人民層」所構築的巢狀單一心智。此等洋溢豐饒的沛然激情，絕非被操控或規訓，而是集體的自主訓誡與嚴厲懲罰少數不從者的成果。

但是，我從2014年的3月18日到4月10日這段時間所經驗與觀察到的「集體心智」，並不那麼類似路況所比喻的「吸血魔怪」之殺戮（類）軍隊屬性，而是類似電腦叛客科幻作品裡，或經循循善誘，或是歡喜自願處於「記憶養殖」狀態的馴服主體，也就是沈醉在「自己的歷史記憶，自己塗抹！」那樣的主體狀態。這情景倒是道盡了一個讓我們不得不正視的現象：參與者既非「無知」，也不是「被洗腦」，參與者本身的「腦／心智」是一個經由長期滋養，以至於散發著熱愛的台灣人主體，是一堅持著疑懼「非公民」異物的集體蜂巢。這個充滿自我良善感受的蜂巢，並不認為自己「排外」（它只是「反中」）；更精確的說，它至極「自覺／自決」地，也就是全然自主地，選擇了排／厭／疑「中」（不區分中國人，中國民族性或中國統治機器）。這是由眾多參與者高度自覺且敦促構成、以右翼民族主義為主導綱領的一場運動，絕非任何自詡有魅力的領導人物所能擅自操控，或是改弦易轍。

此種由當事者重複修編改寫以服膺「民主訴求」的記憶機制，總是機敏警醒地以「部份代替全體」的方式來敘述全景的某些角落或片段。即使自身的視線看得到一種以上的景觀，也會盡力在生命

治理系統內從事無微不至的細膩調控：隨時修改、銷毀或塗抹掉內在「小警總」檢視之後、認為不該編纂入「正史」的資料與事件。如此經常性的塗抹擅改動作，發生在同一個（組）主體的身心之內，並不會引發所謂的多重人格精神分裂，也不會造成主體與其認同的消融危機，反而證成了常態主體養成不可或缺的安定性：主體從外界與己身的內部發掘「異物」的存在，驅動超我化身的維穩使者，從事各式各樣的修改塗抹與消除清掃。此動作既是由內而外、亦是（共時性）內外交互共構，從無休止地清理剷除被蜂巢共同體視為不可收編的他者。

舉例來說，在押井守的動畫電影《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 1995）裡，公安九科在偵查跨國資本主義與國家機器鬥爭的過程中，無意間發現了某種「養殖活屍」的手法，可以植入完整細緻、溫馨正典的家庭記憶，而破獲非法植入記憶的鮮明案例之一，就是某個清道夫拿著並非他原有的照片，篤定認為照片中人乃是自己的妻子與女兒。即使在認清了植入畫面乃是虛構而感幻滅，在理性層面認知到照片中人和自己從來都沒有相處過，甚至這可能只是一張無中生有的假照片，當事者仍彷彿是信念般的，緊抓著這張像是生命中最後一絲稻草的圖片。由上述的情節，我們得知其隱喻的森寒現實：常態主體的「同一性」之所以能成立，總是奠基於邊界的不斷修改與更迭，但這樣的修改又不能過了頭，侵犯了原來的信仰。常態主體也不可能經由揭發個中的精細治理與操作，就得以輕易警醒到，自身設想的「民主／安定」，那個自己永遠在追求並藉之與現狀對抗的大異己，乃是異曲同工的對手與同謀，就像是動漫電影中那張無法被收納入常態主體認知的照片，「實則只是自己（的幻想）」。再者，邊界總是貌似多元且相互衝突：舉個經典的例子，在太陽花學潮的熱潮，「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許多成員攜帶

嬰幼兒前往，並與較不守規矩的夜間作息人士發生爭吵。處於光譜的兩造，追求「解放」的賤民與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對於作息時間的爭論，突顯了「家庭原教主義」透過參與太陽花運動所想像的「更好的未來」，其實就如同此記憶養殖片所培育的常態圖景，清楚排除了許多不合格的公民與非公民。這麼說來，就連占領立法院周邊者的「革命」作息，也不可以超逾良好正典家庭所允許的守護兒少邊界。

路況將學運領袖比喻為「夾道黑衫軍萬眾歡騰高呼「選總統」……〔之〕少年法西斯之阿修羅魔界轉世」，藉以批評學生領袖對民主代議制度的想望，只會滋養出「美好潔淨」的納粹政權。雖然我不確定路況用以指涉的少年阿修羅的是哪一部動漫文本，然而，若以狄野真的少年漫畫《孔雀王》與相關的動畫或電影來權充比附，「阿修羅王」彰顯的是某種絕倫獨特，乃至不可能有任何別的候選者可以取而代之的魔魅精英特質。也就是說，或許學生領袖不是阿修羅，因為他們愛家愛國愛「我群」（亦即條件特定的「台灣人」），所以並不可能藉由「民主黑箱」來產製不愛國不愛家、拒絕民粹自由主義的「反群眾」。藉此譬喻，我想清楚標示的是，與其將這些青少年看成是「阿修羅」，他們可能更類似日本科幻動畫《新世紀福音戰士》系列當中，可以量產的賽薄格（cyborg）人形機體，又或是隨時可以複製再生，且聽從軍國主義科學家命令的駕駛員綾波零。正如同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必備的綠色島國軍服外套（以及後起研發號稱等尺寸的造型性器官玩具），象徵了某種類同性與可替代性，太陽花的領袖（群）並沒有獨一無二，非誰不可，而是只要符合熱血青年的形象，並與台灣國族認同插槽相容的肉身即可擔任，一如綾波零的迷魅其實不在自身，而在於其招牌的冷漠機械性神情、藍髮紅眼、制服、肉體指數，以及與賽薄格人形機體

插槽共鳴配合之巧妙與完美。

換句話說，若我們企圖理解太陽花政治的力道，不能只看到檯面上的領袖圖示與主導意識，而必須看到其背面的闇量、亦即被排除出境的「殘餘／渣滓」。正如同胡慕情在〈擁有可以反抗的父親〉這篇評論²所道出的恐懼：

隱隱然感到恐懼：為了龐大群眾的多數，深刻連結賣台與行政程序的關聯且激昂地表達出其被操弄悖反的仇視，聲稱一旦失去形式民主，即是賣台，要這個多數人直選出來的總統，放開他的權力。

恐懼於，思想上的交換不易流動，原先流動的現場，卻拉起了強制的行走路線。一開始其實沒有這些分工，而是人數眾多後才形成。形成的過程未經主要團體授權，而是現場「誰最敢說話、最大聲就成為那邊的管制者。」這彷彿一道隱喻。這個現場，勢必要曾有經驗者才有辦法掌握與照顧，那些過去在弱勢議題中試圖顛覆現有結構的團體，因人數不多，幾乎無法分心照顧外場龐大群眾的需求，換言之，外場實際的掌握者，是「敢說話」的人。吊詭的是，公民運動的主體應該是這些群眾，而捍衛的「民主」則是主場與現場主體互動跟激盪的內容。但激盪並不存在，僅剩拿起麥克風重複表述「國民黨多可惡」的一言論。

就三月迄今的觀察，我們可以為胡慕情的觀察做出暫時的結

2 胡慕情，〈擁有可以反抗的父親〉，《天下獨立評論》，2014年3月25日：<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7/article/1158>。

論。這些擁有「父輩」（民進黨團與台獨長老群）來充當噶聲反抗之人形道具的新一代島國青年，他們構築出來的團體性乃是「台灣早已實質獨立」的進步法治「國／家」（nation/state）。這群前進島嶼、擁抱天光的熱血青年（與台派諸眾）顯示出當前最優越的進步性，一方面唾棄已經腐爛敗壞、失去黨外運動時期理想性的政黨大老（如民進黨現階段的「四大天王」：蔡英文，游錫堃，蘇貞昌，謝長廷³），同時也以參雜著鄙視憐憫與不時追悔反省自身「過於高傲」的熱烈憤情姿態，將立法院前站哨多年的台獨老人群體視為落後退伍、訴求顯得不知所云（意即毫無普世民主思維的倒退民族主義殘餘）的下位者。然而，實際上，太陽花眾卻又不得不將這些「獨老」視為墊腳石來使用。這兩造（民進黨政客與台獨老者）的組合，奇異地構成太陽花群體所不恥的「父」。年輕學生們與「三師」（大學教師，律師，醫師）的純淨進步公民組合，就在這段時間，持續與自身視為遺毒瘡疤化身的「父老」——包含許多性／別的擁權長老主體，而非僅僅是生理男性長輩——形成共構共謀的華爾茲舞步：藉由時而反感痛斥，時而撫今追昔，進步的太陽花發展出進步台獨右翼最新世代的「弑親與繼承」陣式。

3 關於民進黨正規版的「四大天王」，根據蘇貞昌的維基如此記載：「蘇貞昌與呂秀蓮、謝長廷、游錫堃四人，於陳水扁執政時期合稱民進黨的『四大天王』，與蔡英文則因政治競合關係而被媒體稱為黨內的『兩個太陽』。」參見：<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B2%9E%E6%98%8C>。

「勿以我等之名！」：挪用「性／別洗禮」為輔助側翼的「太陽花」

太陽花運動有許多的分殊與枝節，迄今形成了表層繽紛、但內核一致性驚人的細緻階層佈署。從一開始的3月18日闖破立法院之夜，到我寫下這篇文稿的此時（2014年8月中旬），參與者從「（被）奪發言權」進化至主動製造發言契機（例如抗議中國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而發生的侵入桃園機場旅館房間的事件），再進而分化進擊為各種宣傳（例如各種各樣的「懶人包」與社群媒體上的交鋒），如今已堂皇地進入了爭取歷史詮釋主權的時刻。主流且友好呵護太陽花運動的媒體（最明顯者如《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壹電視等），悉心營造這是一個真正駁雜異質且有「內部強烈差異感」的多元群眾景觀，既有鴿派、鷹派，充滿外交手腕的立院主導勢力，也有激烈不從的「側翼」；就性別政治而言，這些媒體也非常努力地呈現出「有男有女，有同性戀、異性戀，還有同志酷兒呢！」的友善氛圍⁴。然而，從媒體報導在不同事件上的懸殊待遇與落差

4 關於這樣的「氛圍」操作，可從《自由時報》以「異常正面」的再現手法報導我在立法院的演講為例，見〈遍地開花：世新性別所洪凌籲周美青加入女同志〉，《自由時報》，2014年3月28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977710>。不過，緊接著，四月時我書寫了〈秩序之虐：太陽花／大腸花的排遺與孽瘡〉這篇批判意味甚重，顯然一點都不「台派」，且被反感者逕斥為「天朝左派」的文章（發表於《苦勞網》，2014年4月13日：<http://www.cooloud.org.tw/node/78197>）。「酷兒學者挺太陽花」的美好想像於是褪盡，本篇文章的讀者回應和3月28日演講時的高亢歡樂形成極度反差，其理由不言自明。

中，我們幾乎可以推論出：某些原先自認「不屬於」該運動的基進主體或性別政治（如酷兒），在太陽花學運的場域裡，很難不淪為台灣國族主義的「僕從」和「幫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從事基進行動或本身即為性別研究者與運動者的「幫手」，就算偶而有靈光一閃的覺悟警醒，似乎也隨著「大勢／大是」所趨，而無法自拔地扮演起從屬謙卑的角色。

陳逸婷〈拒絕打手槍、抹黃的太陽花好公民〉一文⁵，清楚論證出某些「性／別」主體無論如何展現，只要不服從這個「台灣男好棒棒」的意識型態，都只能是卑賤低劣的「渣」：例如被鄙視到極致的「偉中太后」（即隨「白狼」張安樂到現場挑釁抗議群眾，且被張安樂誤呼其名為王偉中的王炳忠），或是壓根不被允許罵「幹」（因為這樣還是很「娘」）的總統馬英九。更別說，就算是太陽花的「高階幹部」，約莫只有符合「生理男，異性戀，表面維持單偶，堅決台灣獨立者」等條件者，方纔有權力大聲說「幹」，且被歡呼叫好。除此之外，其餘成員所罵的「幹」都不會被群眾熱烈歡呼，直呼「好man，真男人」。罵「幹」的生理女性（或任何不合格的「不男不女」）則得承受內外夾擊的「好女人」與「性別馴化」規章（如台大教授范雲或是藝人「雞排妹」鄭家純在大腸花論壇的講話），以致所有的酷兒與性別研究者只能成為太陽花側翼之外的「邊邊角角」，連遭致性／別霸凌也被核心主事者認為是「次要小事」。

在這個國族夾纏性別的偏斜套式，性別政治的學者與學生們被迫或自願地大規模服務了右翼國族男性思維，尤其是正典普世單偶好男好女想像的國族主體，其發言與沉默都整齊均勻地搭配了「台

5 陳逸婷，〈拒絕打手槍、抹黃的太陽花好公民〉，《苦勞網》，2014年6月18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9085>。

灣國」的性別治理原則。從「鴿派好男人幫」為主的男性領導者（如黃國昌、林飛帆和陳為廷），乃至於近來堅決抱持貞潔台灣人論調，反中國學生選大學學生會長的「側翼鷹派」，群眾無不歡呼擁戴他們動輒罵「幹」與說「不」的權柄，無論（或正由於）他們是以多麼鮮明激烈的恐懼異己與憎惡「匪諜」為原則⁶。基於太陽花眾的「表舞台」（或說「前台」）是個悉心打造出反「抹黃」氛圍的純淨學生市民場域，一段時間下來，各系派各路數人馬之間（與之內）所累積的不合、焦躁、性匱乏或挫敗、政治扞格等種種龐大的「負面情緒」，即使不能堂而皇之地淋漓抒發——「台派男性」的性與情慾壓抑就是在「罵幹」與「反抹黃」的二元共構所成立——然而，基於耦合與某些必要條件，太陽花的副產品就是台派版本的rap：「大腸花論壇」。此論壇堪稱紓壓聖品，在夜色深沈之時，由「音地大帝」擔任主持人與DJ的角色，為所有的參與運動者，無論是核心或邊陲，主導團或賤民眾，罵幹男或（被）規訓女等主體提供了一個人人皆可罵「幹」（但「人人」除了罵幹之外什麼也不能）、足以發洩出隱忍壓制久時性欲力的「下體疏通溝渠」。

有趣的是，相對於動輒表演給主流媒體看的台灣男兒「幹」，

6 佛國喬等特別明顯近歐親美的「側翼」台派人士，在反中國學生競選的論戰於焉成為「貞潔牌坊台灣人」的化身。此種「台、中授受不親」之民族處身身體論，終究以「側面護翼」的姿態，支撐且共構了黃林陳等正典男性性（normative male sexuality）之「台灣男兒好幹幹」的性別位置，這也再度印證：只有某些正港台灣人有權力大聲說幹，且被歡呼叫好。至於所有「側翼」的台灣人，則是不分性／性別地要維護「台灣的貞操」。佛的主張，見其臉書貼文（2014年8月13日）：<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51112308286588&set=a.733885573342595.1073741837.100001634771204&type=1&theater>

或是充當「下體疏通溝渠」模式的大腸花論壇，在太陽花群眾之內，迄今都找不到任何一個鏗鏘有力、集體性發聲、拒絕服務國族主義的性／別聲音，激進地拒絕此男性正典之「幹得理所當然」，並且將色情語言（與行為權）搶奪回來。如此，我們更無須訝異，當陳為廷的「小熊為廷」——那件散發著男性荷爾蒙的原味汗衫——在露天賣場拍賣時，良婦女性主義者和團體或許並不痛快，但不會去介入或痛斥其「物化男體」。然而，同樣作為「物件」的雞排妹胸罩，其拍賣活動（雖然是幾乎如出一轍的「性主體自願販賣自身相關物」）得到的卻是大眾之強烈反感與奚落。在此時，國家女性主義學者的聲音是全然靜默的，但這樣的「靜默」就是某種刻意反翻了一圈的宣示：唯獨在對太陽花學潮有利，且符合性自主（但不可為性解放）的性／別主體需要發聲時，婦女團體纔有可能助陣。同時，同為「性自主」的商品販售行為，婦女團體對男女兩性審核標準的落差之大，凸顯出非常悲哀的吊詭等式：良婦女性主義對女性身體堅持自我戒嚴，非但拒絕為真誠的性自主者——如雞排妹——站台，更無視她的主張和存在。此種保守與壓迫異己的操作，和女性主義動輒捏塑出的巨大他者父權體系，是類似到幾乎「不分」的狀態。

在此，容我大幅引用陳逸婷對相關事件的論證，來進一步說明上述的分析。我認為此種接合階級與位置的分析，才有可能奪回當前台灣女性主義與性別政治被國族運動所遮蔽的「性與性別自主權」：

學運過程中，還有另一論線，主要是由婦女新知主導，訴求爭取「身體自主權」。學運後期，出現穿皮靴上街的太陽花女王、薄紗女（呂女），先是填補了學運當中，在專業與溫柔形象以

外的另一種女性形象：被以「正妹」、「性感」……等較不具知識性的形象包裝後出現。

其中，呂女因為穿薄紗被名嘴在中天電視台的節目上公開表示「在她旁邊睡不下去」，引述聲援團體婦女新知的說法認為名嘴傳達出「意淫女體」、「踐踏女性主體性」等性別歧視訊息，而一對被拍到一起蓋棉被、接吻的情侶，則認為名嘴以「吻到累的時候，還抱著一起睡覺」等言語將其「抹黃」，雙方進而對中天、彭華幹和戴立綱提告，並分別求償2,337萬多元。

另外可做對比的例子是學運後期，19日的大腸花論壇邀請藝人雞排妹，當天在民眾鼓譟下，要求大家邊罵「幹」她邊脫下身上穿的內衣，不過，同樣拍賣「原味」，雞排妹的舉動卻不若先前陳為廷拍賣原味T恤，獲得輿論一致好評，反而遭到網友撻伐。

那麼，同樣是身體自主權的展現，不是說「我的身體就是我的政治」嗎？雞排妹的行為還更有點女性情慾的味道，為什麼不會被婦女團體陣營號召，成為聲援對象？因為，雞排妹的行為，所昭示的事實是一個女性藉著「自我物化」、「賣肉來賺錢」，該形象跟伸張身體自主權的差別在於：受結構壓迫的受害者形象多於自主選擇形象，就如同多數婦女團體不傾向主張性工作者的工作權的邏輯是類似的：我們怎麼可以鼓勵這種對女人的性與身體進行剝削的事情呢？我們頂多，可以救援他脫離火坑。

陳逸婷的文章已經詳盡分析「太陽花女王」與「薄紗黑衣女」的身體政治被見獵心喜的女性主義團體（即婦女新知）遴選為代表的案例。但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婦女新知的操作方法論顯然以「法理女性主義」為準則，以這兩名單身「正妹」的受害者搭配一組「未

婚夫妻」（但已經訂婚）的單偶人士為原告團，對中天電視台名嘴彭華幹和戴立綱進行提告。當事人（性感，但不能被說為性感的黑衣薄紗女，以及裹棉被進行情慾活動的「貞潔未婚夫妻」）在民事訴訟的官司訴狀中，要求中天與名嘴賠償每一組受害者「兩千三百萬餘」的新台幣。我認為這個數字非常險惡，絕非隨意挑選某個巨大的象徵數字，而是以柔性的誘導恐嚇來奠定了「台灣國共同體」（不分男女，不分異同，不分踢婆，不分C貨MAN貨）都必須奉為圭臬的無上教條：兩千三百萬台幣，喚喻著對號入座的「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亦即，無論是否贊同以良婦法理女性主義的法則來懲處「好色，開黃腔」的男性名嘴，身為兩千三百萬人民之一的「我／我們」，不贊同如此的性別政治的「我／我們」，竟然只能等到這篇文章的寫作，纔堪堪有了起碼的異議空間。

倘若近期以色列（與在其背後助紂為虐的美帝和歐盟）的軍國法西斯機器，以優越猶太民族復興論（即錫安主義）的名義，毫無所感地恣意屠殺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民，進行徹底的種族清洗（當然也連帶清洗了所有不順從此意識型態的，具有猶太血統的左翼人士），目前最徹底的抵抗勢力莫過於國際連線的共產黨／左翼連線。在同樣是「血統的猶太人」當中，尤其是「以色列共產黨」與「猶太人和平之聲」等左派政治與社運組織，面對錫安主義的猙獰暴虐，形成了非常強而有力的反向呼籲。此種呼籲，類似我想要對（介入太陽花運動的）良婦女性主義所提出的反論，希望能清楚言明，何以「（複數的）我」反對以此種粗暴方式來操作性別（馴化）政治，反對此等讓女性主義淪為「男性大義民族主義御用女僕」的現狀處境。我／我們要求：請「勿以我等之名」來索求（我認為並不正義的）兩千三百萬元賠償金，請切勿脅裹騎劫含我在內的酷兒左翼（與任何不支持此政治主張者），來填充這個虛妄的「兩千三百萬」台

灣人民⁷。「我們」拒絕成為兩千三百萬人這個分母的成員，請在所主張的兩千三百萬元的補償費當中，減去「我」被無視意願所強加的那一塊錢。這樣的「一塊錢倫理」，是酷兒左翼的起點，也是對「愛國愛家，性別正典」治理系統的最微小抗議，亦是對其強迫同化的拒絕。若是這樣的訴求被視為廢話或不被看見，那麼，我們可以看出兩則必然導向彼此的等式：一、唯有支持此種被側翼化的性別政治與太陽花民粹國族者，纔會被認可為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一員；二、酷兒左翼的性／別，根本就不被太陽花共同體所正視，更可能被視為理當連同「外來者」一起「滾出去」的異質物體。

左翼酷兒的（不）家庭政治：「我們」要「幹」出怎樣的「中國人」？

在太陽花運動熾烈時期，出現了兩組保守的婚家民族國家與性別制式的倡議，但得到了相當不同的待遇：前者得到無數溫情拍摸的唏噓與感嘆，後者則被斥為「中國人（或「426」，此乃負面指稱中國人的台語諧音）滾回去，台灣海峽不加蓋」。前者發生在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為抵制核四商轉進行「無期限禁食」的時候，其妻寫了一封信，緬懷在1980年代林家血案被殘忍殺害的雙胞胎女兒，她溫情款款地設想了一對良好女子「彈鋼琴，交男友，長髮披肩，結婚生子」的未來。後者則發生在「白狼」張安樂以中華統一

7 關於「勿以我等之名」的論證與巴勒斯坦抗爭的左翼酷兒分析，見洪凌，〈以「解放加薩（眾）」為綱領的酷兒政治與文化研究分析〉，《苦勞網》2014年8月6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9564>；洪凌和王穎中，〈「我」為何拒絕Jason的道歉〉，《苦勞網》2014年8月8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9657>。

促進黨主席的身分前往學運現場，與台派人士相互嗆聲對罵中，惱羞成怒（或是心直口快地）爆出的這句生物性的寫實台詞：「你們不都是中國人幹出來的？」⁸

這兩組「國族身分幹出後代（未來）」的常態性別想像與媾和「統／獨」陣線的身分政治，就酷兒反婚家國的立場而論，我對其批判大約是一致的。林家雙胞胎被斷送的「未來」，如果就只能當個長髮披肩、溫柔婉約的好女人，並成為誰的妻母之類的话，對我等左翼酷兒而言，並不是個多麼值得欽羨的未來版本。至於白狼事件，除了性別刻板與血統迷戀外，我認為身為「黑道老大」且顯然是個優渥資本家的張安樂，恐怕更是維穩鞏固資產階級的使者。然而，白狼暢快地曝露腦內潛台詞的「行動宣示」，倒是從垃圾罐頭裡掀起一堆蚊蟲。若說白狼值得被批評，就不可能不看到太陽花學運對情慾多樣性與非正典性／別的「有看沒見」，以及各種伴隨而來的輕蔑與打壓。要說張安樂保守反動？這自然毫無疑問。但他保守的民族異性生殖沙文主義與目前甚囂塵上的「台陸授受不親」，或由太陽花學生主演，迄今仍然叫好不衰的「好學運男學生背後都有賢淑台灣女生充當服務角色與賢妻」的性別劇本，甚或「呆丸男說幹幹耶好棒棒」等讚嘆，雙方都挪用了類似的正常化性別區隔，以及性恐懼與性管制的雙軌禁制。當然，這兩種性保守主義並不是沒有差別：前者是大中國民族主義的異性生殖主義，後者是小島國民族主義的幹男淑女歡天喜地。兩者同樣強調血脈／民族／國族的內部疆界之嚴密，生殖繁衍之大義，（生物與思想的）血統之純正。

8 〈白狼亂罵：你們攏是中國人幹出來的〉，《蘋果日報》，2014年4月1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401/371145/>。

如此，我們可以反過來詢問，在太陽花運動當中（直到現在），不是被奚落就是被排擠的「台灣左統」，有無可能營造出一條既不「資產統派」，也不追隨大中國生物性別政治的路線？左統的各個成員團體當中，有無任何可被參照的「酷兒／罔兩／不家庭」的痕跡？更甚者，我想追問與期望的是，可否有一種左統政治觀，在包含了各種「對世界的好奇與慾望」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滋生出一股與當前國際左翼連線的政治博弈氣魄，既不偏執追求（與武斷定義）生物性的「中國人」認同，而願肯定與承認複雜的、自我定義的各種「怪胎中國人」？這樣的中國人認同，必須是擁有複雜的批判力，對於資產階級、性別常態、狹隘民族激情與仇外心態，都堅守著不輕易「容讓」的基進左翼位置。同樣重要的是，這樣的「變種中國人」，無論在台、中、港、澳或任何地區，必須嚴厲峻拒「愛國愛家愛妻小」之自我感覺極度良好、殘酷愚蠢的小資公民心態。或許，這個辯論棋局可以讓我們回到趙剛在〈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中提及的「如何做（幹）一個中國人」之命題⁹。如果我們要的並非僅止於「生物性（被）注定」的「中國人」，左統主體必得真摯面對性／性別、國族／國家、階級／位置等命題的彼此纏繞與糾葛，而非單向度地高唱大中華民族主義，從而坐實了「名左實統」的指控。

在台灣，「做中國人」這個命題，難免爭議。包括我在內，第一時間亦感到不舒服，並任由自身反射性抗拒感的導引，認為趙剛所謂「做（成）的中國人」非得是服膺大中國民族主義，且無視性與性別差異的「中國人」。但是，細讀之後，我認為，趙剛意圖闡

9 趙剛，〈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第九十五期（2014），頁263-284。

述的「做中國人」或許不只是這樣的正典想像：

台灣的問題從來不是台灣的問題而已，而台獨的問題歸根究底是中國的問題。中國在當代世界裡，除了經濟崛起、政治崛起之外，更要面對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如果在將來，中國作為一個理念，涵蘊了一套有召喚力的價值與實踐，形成了一個能提供給人類新的安身立命，以及與萬物相處共榮的道路，或至少能提供給區域人民以正義、和平與尊嚴，那將是「台灣問題」解決之道的根本所在。這是有希望的，因為西方的發展模式、霸權模式、欲望模式已經圖窮匕現了。這個世界不能再繼續被美式的生活及其制度所挾持了，所有人，包括西方人，都需要創新思維。台獨未嘗不是在一個世界不知要向哪裡繼續走下去的焦慮下的一種退縮性的、封閉性的、孤立性的、自了漢的立場，而這個立場的激進化又不得不說是因為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興起這兩個因素的共構。「中國」是什麼，也許竟是當今世界的一個最重要問題。而這麼說來，什麼是「中國人」？如何當一個「中國人」？就不僅僅是生活在台灣有著國族認同焦慮的台灣人民與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更也是中國大陸人民與知識分子的問題。

然而，我無法為趙剛辯護，宣稱他的「中國人」想像有無溢任何進步知識分子話語之外的可能。倘若要任何酷兒成為「左統」的廣義成員，或是此意識型態的同感者乃至支持者，我想提議的是，任何不服從既有常態中國民族主義典律者，都得進行非常用力且不管自己是否會「黑掉」的抗衡，戮力地干涉現狀，不屈從地與大敘事辯證與鬥爭，鬥出一個有別於常態正典「中國人論」的政治布局。

對於常態性／別的左統主體，劉人鵬與丁乃非等酷兒學者所論證的「罔兩」位置與「毀家廢婚」論述（前者演繹自莊周的文本，後者則援引清末民初無政府的左翼性別思潮），都來自不能更「中國」的理路。但是，這樣的「中國」思想——能夠清楚展示被第一世界帝國主義普世新道德所遮蔽的各種崎嶇不平、怪胎異狀的思想——是否也可能納入左統的思想範疇？或者說，有無可能在趙剛式的「中國人論」中，也考慮上述這些理論與政治的重要性？更深思熟慮的哲學辯證，或許不只是尋探「左統當中是否有酷兒？」，或是「追索酷兒陣營的左統傾向（者）」，而是開啟另翼耙梳歷史文本的計畫。並非將「左統」與「酷兒」視為固有本體的兩股屬性，而是透過兩者「共有」與「之間」的社會主義生命關聯，基進地翻寫原先的本質論述。

作為結尾，我想提供某個自己感到親切的例子為切入點。在太陽花運動的高峰時期，鄭鴻生寫了一篇短論〈哀楊逵精神的失落〉，哀痛地悼念楊逵的左翼精神無法被其生理後代所繼承¹⁰。在此引用當中的一段：

（楊逵）以左翼進步知識分子的立場帶頭發表了「和平宣言」這件事，並因此而入獄。這時的國共內戰正是接下來四十多年全球冷戰的前身，……分離勢力在這次「反服貿」鬥爭中所能動員起來的各種社會力量，包括學生教授與媒體輿論，確實難以

10 鄭鴻生，〈哀楊逵精神的失落〉，臉書貼文，2014年4月8日：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9%84%AD%E9%B4%BB%E7%94%9F/%E5%93%80%E6%A5%8A%E9%80%B5%E7%B2%BE%E7%A5%9E%E7%9A%84%E5%A4%B1%E8%90%BD/558171514302190>

低估。反服貿運動的場內主導群所提出的多是表面理由，而其所隱含的分離意識才是實質，這點我們都很容易認識到。但是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問題，就是這整個運動的實質是與這些年來以美國價值為核心的某某花或某某顏色革命遙相呼應的，美國因素是最大問題所在……

楊翠母子成長於台灣從民主化到全球化的美國價值籠罩台灣的這三、四十年，或從更早說起，在這半個多世紀來，包括我在內的戰後嬰兒潮開始的台灣新生代，學會的不僅是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思想，還有美國的各種文化品味……這個美國因素的癥結不得解開的話，這個分斷體制會是堅如銅牆鐵壁，那麼這次楊達家族所顯示的台灣人世代逆轉的反諷與悲哀，恐怕就不是兩岸表面的和解可以消弭的了。

雖然我喜愛且同意這篇文章，但必須指出，鄭所忽略或拒絕之處，或許正是左翼酷兒如我，會撿拾且重新玩味之處。即便楊達的生理直系親屬（楊翠與魏揚）走向了「親美反中（共）」的台派自由主義道路，楊達的精神非但沒有失落，反而以更純粹真實的去血脈傳承型態，親密地座落於鄭鴻生自己與許多左派的生命體內。始終深愛（剛好是血脈的）家族成員是一回事，意識型態與信念不可能有先天必然的傳續性。奠基於「不家庭」的政治基礎，若有「左統的酷兒」思惟，就得將傳承的認識論提昇到不可（能）讓血脈占到便宜的「超克基因」情境裡，堅持思想與知識是由處於耦合時空的每個主體與位置化身，喋喋不休且反覆不已地凝視歷史，讓這些糾結慾望與推動歷史的刻痕鑲嵌在肉身神魂的各處。終究，要讓這樣的楊達（以及他們同世代的台灣左統）更徹底地「活著」，應該不是透過馬克思主義強烈批判的「生殖再生產」，而該經由非狹隘

血脈所能及的寓言性「再生」。他們的意志、慾念與情思，滲透融入了現有的左／統個體戶與組織（如夏潮、勞動黨、勞權會等）當中，形成如「生化共同體」般的關聯性。此等的關聯性與親愛的同志傳承，反逆且顛覆了傳統華夏中國「子女繼承父母身心靈肉」的想像，將是國際左翼視框更宏觀與清澈的身體實踐。

如此，從拒絕太陽花虛偽的兩千三百萬頭顱為起點，這個罔兩左翼的「我們」，不僅要拒絕處子情結，同時更要拒絕生殖主義式的「婚家國忠誠論之大中華民族」視框。我們必須設想一個再怎麼怪誕詭奇的生命情境也可以被接納的左翼東方紅色世界／視界，纔可能以這個基礎為啟程點，從事各種反駁第一世界普世構造所製造的，虛妄且問題叢生的「遍地開花」。

洪凌，現任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包括酷兒理論，科幻小說，精神分析，文化研究，左翼批判等。出版作品計有論述／散文集、短篇小說集十餘種；長篇小說包括《末日玫瑰雨》、《不見天日的向日葵》，以及【宇宙奧狄賽】系列共六冊。論文發表於《中外文學》、《文化研究》、《國際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月報》、《台灣社會學季刊》、《思想》等。